

新興殖民都市的真相

——以〈新興的悲哀〉與《濁流》

為探討對象

崔未順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從十九世紀即已開始的都市化現象，直到今天，仍以快速複雜的樣態持續在進行當中。面對生活環境中來勢洶洶的都市化趨勢，文學也開始關注都市的本質問題，探討起都市化現象帶給人類的影響以及它所具備的意義等等議題。一般來說，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中，都可見到資本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在國家強力介入市民社會的特定歷史階段，都市化及都市空間，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強烈的政治性支配。以日據殖民地時期為例，台灣和韓國的近代都市，其形成和發展即或大或小直接受到日本殖民政策的制約和影響，如殖民資本主義的引入以及其後來的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民族差別等問題，其空間的政治性，比起往後的任何歷史階段都要來得直接而嚴重。

本文以日據時期台灣小說蔡秋桐〈新興的悲哀〉和韓國蔡萬植《濁流》為對象，探討了新興殖民都市的建設過程、都市空間的結構性特色，以及其中的殖民地人民生活樣態和精神意識。台韓兩國同樣都受到日本的殖民支配，並在日本所主導的計劃下推動殖民都市建設，因此，選出兩篇同是探討由日本主導

興建的殖民都市的小說，據以比較考察殖民都市和人民生活的關係，有其必要性和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韓國小說、殖民都市、都市空間

The Reality of Emerging Colonial Citys
— a Study upon Tsai Chiu-Tung's (蔡秋桐)
“An Emerging Sadness (新興的悲哀)”
and Chae Man-Sik's (蔡萬植)
A muddy Stream (濁流)

Choi, Mal-Soo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Urbanization, which was started from 19th century, has been rapidly continuing in fast and complex form till today. Literature has yet started to take notice of the essential urban problem, when facing the fierce urbanizing trend in life, and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n human life and the value, etc. of urbanization. In general, all aspects in daily life can be seen i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that nation strongly intervene the civil society,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pace inevitably follows intense political domination. Taking Japan colonial period as an instanc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in Taiwan and Korea are more or les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olonial policies, such as

the importation and the following expansion of colonial capitalism caused the problem of disunion of social classes and ethnic differences. The political issue was more direct and severe than any other historical stages hereafter.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aiwanese novel Tsai, Chiu-Tung's (蔡秋桐) 〈An Emerging Sadness (新興的悲哀)〉 and Korean novel Chae, Man-Sik's (蔡萬植) 《A muddy Stream (濁流)》 in Japan colonial period. The novels had investigat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emerging colonial cit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ce, and the lifestyle and spiritual awareness of people in the Japanese colony. Both Taiwan and Korea two nations were governed by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citie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Japan. Therefore, by selection of two urban novels that had commonly discussed the colonial city constructed by Japanese colonialism, to analyz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of relationship of colonial city and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becomes necessary and profound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Japan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novel, Korean novel, colonial city, urban space

新興殖民都市的真相

——以〈新興的悲哀〉與《濁流》為探討對象

一、前言

人類社會從十九世紀即已開始的都市化現象，直到今天，仍以快速複雜的樣態持續在進行當中。面對生活環境中來勢洶洶的都市化趨勢，文學也開始關注都市的本質問題，探討起都市化現象帶給人類的影響以及它所具備的意義等等議題，所謂「都市文學」也就順勢而生。一般來說，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中，都可見到資本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在國家強力介入市民社會的特定歷史階段，例如日據殖民統治時期，都市化及都市空間，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強烈的政治性支配。所謂「空間」的成立，一般容易認為係來自歷史、環境因素所自然形成，但事實上它的形成可說是一種社會的產物，也是一種貫徹政治性的過程。以日據殖民地時期為例，台灣和韓國的近代都市，其形成和發展即或大或小直接受到日本殖民政策的制約和影響，如殖民資本主義的引入以及其後來的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民族差別等問題，其空間的政治性，比起往後的任何歷史階段都要來得直接而嚴重。

按照橋谷弘的研究所示，日本帝國所建設的殖民地都市，可概分為三個類型¹。其中，第一個類型為在日本殖民支配期間全新開發的新興都市。這類都市的代表例子，他舉出了包括朝鮮的釜山、仁川、元山，台灣的高雄、基隆，滿洲的大連等港灣都市，以及滿洲的撫順、鞍山、本溪湖，朝鮮的興南，台灣的

¹ 橋谷弘，《帝國日本と植民地都市》（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本文再引自金濟正翻譯的《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殖民地都市》（首爾：모티브북，2005年），頁17-19。

高雄等為了開發礦山或工廠而建設的產業都市²。這些都市的產生，由於受到日本計劃性地方改造和新興開發的影響，其政策性、人為性因素相當濃厚，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意識，也帶來了直接的影響。

基於此，本文在殖民地時期台韓兩國文學中，找出以日本全新開發的新興都市為題材的兩篇小說：蔡秋桐〈新興的悲哀〉（1931）和蔡萬植《濁流》（1938）作為研究對象，針對新興都市的形成過程、都市空間的結構性性格，以及其與在此生活的殖民地人民的相互關聯性，進行考察和對比研究，探討兩國文學所呈現的殖民近代都市的意義。此兩篇小說雖然在篇幅上長短不一，而且在描寫層面和故事情節的規模也存在一些差距，但都一樣是講述新興殖民都市的開發和性質問題，以及披露都市開發和發展對殖民地人民的影響，因此作為探討台韓文學中殖民都市空間意義的一個試論，個人以為相當適切。

二、新興市鎮的開發與農民的悲哀：〈新興的悲哀〉

蔡秋桐在〈新興的悲哀〉³中描述都市建設對一個台灣農民家庭，造成嚴重損失，以及心靈上受到重創的故事。敘事時間大約僅僅一年，小說中描繪的新興市鎮，從計劃到建設是在相當短暫的時間內完成。

「T 鄉是將來 S 會社第四工場建設有力的候補地，拓植會社獻身的，願將自己的所有地，分讓給一般農民，組織自作農組合。海口將來築港，T 鄉是必由之地，自然而然成個重鎮。」⁴

如上面報紙所報導，T 鄉的建設和發展計畫，是從拓植會社計畫買賣土地開始進行。T 鄉大部分的土地，地權屬於拓植會社，由當地的農民租來耕作。後來拓植會社的社長從日本人改為台灣人，主張將原本屬於拓植會社的土地還

² 另兩種類型，分別是：在原就存在的傳統都市上面重疊建設所形成的殖民地都市，以及在大都市的郊外另外規劃新市街而形成的都市。前者的例子有台灣的台北、台南，以及朝鮮的京城、平壤、開城等傳統都市，後者則有奉天、新京、哈爾濱等集中在滿洲地方的都市。同上註。

³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第 387-389 號（1931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7 日）。

⁴ 見於《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年），頁 195。本文同書引文頁碼均依此書，不另做標記。

給該地人民，開始宣布買賣，因而吸引了鄰近村民的目光。從報導內容中，可知這個地方原是偏僻鄉下，不過將來很可能成為工廠建設候補地，而且在附近建築港口之後，很可能會成為交通的要衝地帶。拓植會社的新社長台灣人本頭，是一個「老手腕家，也是事業家」，他說將來工廠建設之後，地價必定上漲，因此慫恿台灣人同心協力從日本人手中奪回土地。他的說法，乍聽起來好像是為本地農民的利益著想，另一方面又像是在刺激民族情感，因此很多人便心動起來開始購入拓植會社的土地，做起將來地價暴漲之後，「一時變成富戶」的美夢。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卻是在炒作地皮，所謂自作農組合的組織，只不過是為銷售土地給農民的一個名目而已。他如此巧妙地利用民族情感，煽動民眾的投機心理，致使鄰近人民一窩蜂認為這是難得機會，甚至擔憂萬一錯失良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本頭又提到只要解決水源問題，T 鄉給工廠使用將毫無問題，因此鼓動住民提供勞力來建蓋水路，並且提出自己願意率先捐獻工廠敷地的承諾。此外，不論是日刊新聞、週刊、旬刊，或者半月刊、月刊，所有形式的報章雜誌，為期一個月幾乎口徑一致轟炸式地集中報導和宣傳了這項訊息，民眾也就開始相信他的說法，並注視著 T 鄉的發展動態。

如此，氣氛和條件已達成熟，「有人來問，有人要買的，也有要賤的，摩肩接踵，絡繹不絕，這個 T 鄉為了那幾段新聞之故，真是有幾分熱鬧起來了。」(198) 不過，前往看土地的民眾卻發現沒有地方可以吃飯休息，怨聲四起，這顯示出 T 鄉確實是個偏僻的鄉下，也暴露出市鎮建設計畫的推動太過勉強的窘態。本頭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趕到官衙去與 C 大人商量。C 大人為該地官員，被描寫成一個活潑有為的青年，他不但親自畫出市鎮設計藍圖，還利用他的職位披露消息給媒體，算得上是 T 鄉建設的企劃者兼宣傳者。在本頭和 C 大人的協議之下，市街建設方案大致擬定，市鎮建設就在他們兩人的分工合作下完成：C 大人負責基本設計、企劃和宣傳，本頭則負責宣導民眾購買土地等所謂的實際「運動」。從本頭口中「這層大事業，若沒有警察的氣力是難得成的。」(199) 話中，可知所謂市鎮的企劃和建設，除了官廳與依附支配階層的本土資本家相互勾結以外，還有警察組織的暗中合夥。所謂提出「地方振興」的 T 鄉建設和市街的形成，其實不過是這些人為了個人利益在桌上以空論方式急躁誕生的。

而且，本頭一離開，C 大人馬上就查看所留下當作禮物的香煙包，發現裡面有十票（十元鈔票）之後，隨即滿臉溢出笑容。由這情節，充分可知 C 大人之所以賣力進行新市街的建設計劃和宣傳，其實並不是為身為殖民地官員的偉大使命或名譽，相反地，他心裡想的只是怎麼樣填滿自己的腰包而已。不僅如此，嚐到甜頭的他，想盡辦法製造出 T 鄉已迅速發展和市街興隆的景象，好讓更多民眾上當，進而向保正甲長施壓，強迫他們出錢建蓋商街，同時也為自己能想出這些方法而沾沾自喜。從登場時的一個頗顯志氣的青年氣象，沒幾時就變成利用職權地位，一心想要填飽私囊的腐敗官員，其形象之落差，可說極具震撼效果。如此，在居官廳要職的大人利用職位做出「不要本的生意」，以及本地資產家在他的庇護下，不擇手段地炒作會社土地價格，加上受到 C 大人強求，保正甲長們雖然百般不願意，但又無法抗拒，只好按照 C 大人分配的數量蓋起來的商街，並未花上多少時間，就形成了四十二間的市街，T 鄉的建設也就大功告成。

不過，如此急速建造的新興市鎮，由於並非依照產業發展需求所建，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因素影響，而面臨到不振的危機。T 鄉落成不久，1929 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及為緩和此世界性不景氣，濱口內閣提出的產業合理化和緊縮財經政策，在在都直接影響到 T 鄉的發展遠遠不如預期。為了因應此一危機，官廳竟然放寬先前嚴格規定的衛生條件等各種檢查標準，來克服不景氣造成的餘波。更誇張的是，連賭博業也特別允許，還動用各種不合法手段。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在振興地方的美名下推動的新興市鎮建設，實際上是為了幾個關係人的私利私慾，威脅民眾，動員警察，甚至公然接受賄賂。小說想要述說的是，當權者率先違法，以及整套殖民統治不合乎道德的作為。賭博業的許可，更象徵著作為殖民政府的官員，對其自身職責的完全放棄，再加上私底下收受可觀的回扣，這些情形在在說明，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已經蕩然無存。消失了紀律和法律的 T 鄉，滿街都是想方設法為了弄到各種利益，而拜託 C 大人發下許可營業的投機客，這種人越多，C 大人的佣金和抽頭也就越加豐潤，所謂「地方振興」的真相，其實是殖民統治階層「荷包的振興」而已。

失去了地方振興美名的 T 鄉，緊接著就是「嫖賭飲」享樂業的滋長。享樂業的盛行，原本也是跟日本頹廢文化的滲透有關，在 1927-1928 年左右，日本各地流行的咖啡店，進入了殖民地台灣各地。當時所謂的咖啡店與現今不同，它指的是西洋風味酒店的專稱⁵。咖啡店裡叫作「女給」的女侍，在端送食物和飲料給顧客之餘，也陪客人同席聊天。此外，還有公娼的居住地遊廓，以及各種料亭、舞廳、戲院等享樂場所的滋生。以台北的城內為例，這個地方原本不見遊廓，但是自從日本人來了，公娼進駐後，遊廓場所有如雨後春筍般一家跟著一家開業，萬華地區也就逐漸演變成爲遊廓的中心⁶。

台灣的享樂產業，在殖民地時期成長快速，當時從事服務享樂業的不僅只有台灣人，遠從日本和朝鮮來的女性也爲數不少。日據台灣小說中，也出現這些享樂場地的描寫，不過大部分都被刻劃成誘惑良民或者提供需要者一時歡樂和安慰的墮落空間。例如，楊雲萍的〈加里飯〉（1927）、〈青年〉（1930）；楊守愚的〈元宵〉（1931）、〈瑞生〉（1932）；王詩琅的〈沒落〉（1935）、〈十字路〉（1936）中的青年，無不都是徘徊於咖啡店、戲院、酒家或舶來品賣場間，冀望獲得一時的刺激和安慰。只是，小說中人物的欲望，一般都無法得到這種起碼願望的實現，因為他們不是手中沒錢，就是肩負一家生計，也或者因為長期失業而面臨饑餓邊緣。他們在此都市空間中，承受的是有錢人和警察的冷酷對待和欺負⁷。顯而易見，日據小說中的都市空間，是一個急速變遷的社會縮影，它被刻劃成一個冷酷無情、充滿著爲生存掙扎的不幸人們的空間，同時也是貧富差距和對立日益嚴重的空間。

空間的急速變化，很多是來自日本殖民政府的都市建設政策所致，因而其都市空間通常呈現出具有兩極化的雙重性結構。例如，鄭登山小說〈恭喜？〉（1928）中，過年期間擔任臨時郵差的台灣青年，在領取工錢時感到非常納悶不解，同是郵差，日本人分擔的區域是城內，不僅道路好、區域小，而且容易配達；但台灣人分擔的卻是稻艭，道路壞、區域大不說，也很難遞送。此外，

⁵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2005年），頁22。

⁶ 同註1，頁101。

⁷ 參考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年），第四章「日據時期小說所反映的現代性」。

分明是相同的工作，日本人卻比台灣人享有多六成的加俸特權，為此他更是感到憤怒。這裡台北的城內和稻艭，分別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居住的地方；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中，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活動地方和居住環境，也有天壤之別。台灣人常去的驛前路即是花柳街，台灣、日本、朝鮮的賣春女子叫喊著客人，市場前的馬路，「兩側燒焦似的黑柱子、腐朽的廂房，狹窄的亭仔腳下，豆粕與雜貨類雜亂並陳，傾斜的屋頂上處處長著雜草。封滿塵埃的雜貨店裡，商人像長了青苔的無情的臉，終日沉坐著。滿臉縱橫皺紋的老人，在亭仔腳的地上，伸出枯枝似的腳，銜著長長的竹煙管，懶懶枝打盹著。」相對於此，日本人的住宅卻在連翹的圍牆內，「舒暢地並排著，周圍長著很多木瓜樹，穩重的綠色大葉下，結著纍纍橢圓形的果實，被夕陽的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而台灣人住的馬口鐵皮的矮屋，坐落在狹窄的街道上，雜亂並處，簡陋到「連隔兩三間談話的聲音，也像傳聲筒似地聽得一清二楚。深夜裡鄰居睡覺翻身的聲音，也無遺漏地聽得到」的地步。還有，楊華的〈一個勞働者的死〉(1935)中，雖然不是專門講述都市空間，但同樣也是以貧民窟、豬圈似的屋子和洋房的對照來刻劃台日人居住環境的不同。如此，兩極化都市空間的雙重性結構，反映的就是台日間的區別和貧富的差距，在這些空間中，身為台灣人的小說人物，大部分都住在黑暗狹小的地區，他們或因失業而流浪，或因饑餓而眼神昏暗，連生存都備受威脅。顯然，小說反映的是，殖民都市雖然吸引了從農村移入的大量人口而急速發展，但在殖民政府市政規劃尚未完備的情況之下，過剩人口的雇用和居住問題得不到解決，他們只好被迫住在未開發地區的惡劣環境中，過著一天不如一天的生活。

在〈新興的悲哀〉中的新興市鎮也呈現類似的樣貌。小說刻劃的新市鎮，雖然屬於小型的市街建設，並未開發完成，但都市空間同樣具有兩極化的雙重性結構。日本人或統治階層住在整頓乾淨的地方，而台灣農民的家屋，「卻極其簡單，用竹為樑柱，用蔗葉來蓋屋蓋，比較隔壁K組合監視所是有天淵之差哩！」

(201)此雙重性都市空間，可以說反映了殖民體制下都市化過程中所呈現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民族差別現象。在都市擁有好的職業，過著文化生活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和資產家；相對的，大部分從農村移入的台灣人，逐漸遠離都心，從

事各種日用職工作，最後淪落為都市細窮民。社會階層的分化和都市空間的雙重性，自然會將社會改造成雙重結構，就如都市空間有截然不同的區分，社會結構和文化也呈現兩極化，終究支配著在此生活的人們的意識。剛搬來的林大老雖然住在簡陋地方，但他租下東邊的一塊地，認為「採新興之意，東方是日出之鄉，像日初昇的款式」，因此並不特別在意。但是，K 組合的監視所和林大老所居住的空間雙重性，預示了將來兩者的生活和意識的巨大差異，農民林大老越貧窮，其階層的區分也越明顯。搬到 T 鄉之後林大老不但諸事不順，他的「屋又是為著無情的雨打得屋蓋腐爛，為著橫暴的風打得牆壁破壞。」(206) 相對於此，「隔壁的 K 組合監視所，不顧著組合員死活，不顧著這殺人的不景氣，這回更改築得堂皇壯觀，庭園也整頓得廣大雅致，花也放得異常芬香。」(207) 不僅如此，監視所舉行落成式時，郡守以下官民多數都集合在這美麗雅致的殿堂，大飲落成酒，吃祝賀宴，紅紅綠綠的內台美妓也穿梭其中，忙著勸酒。C 大人和組合監視所日漸發達，反觀像林大老這樣相信政府開發計畫的農民，卻面臨到走投無路的困境。

如此，日本人官憲和本地資產家互相勾結和私相授受而成立的新興市鎮，到底對殖民地基層民眾的生活，帶來何等程度的影響？林大老一直注意報紙上 T 鄉的建設消息，特別是看到自作農組合的組織，以及將來地價的上漲可能，以為 T 鄉才是他要過新生活的所在。他最初偶然透過報紙知道這個消息時，只是「心裡頭有些躍躍起來了」，但過不久各種報紙雜誌天天登載這個消息，拓植會社新社長本頭又口口聲聲保證會為農民組織自作農組合，並不時暗示地價上漲已勢不可擋。近代媒體的公信力和傳播效果，確實發揮了作用，看到媒體上紛至沓來的報導，林大老終於按捺不住，放工後親自去探視 T 鄉，而終於決定搬家。他夢想著將來 S 會社第四工廠設置之後，地價再度上漲，他就可以成為富戶，因此不僅自己一家，還對親朋好友傳播了這個訊息，等到報紙上登出 T 鄉市街落成的大廣告時，林大老一行數十戶就都搬到了新市鎮，懷抱著無比的希望與憧憬。雖然過不久他所期待的自作農組合成立了，但是正好受到不景氣和緊縮政策的影響，原本計劃的新創事業就在無望中收場。篤信基督教的他，原本還對教育事業抱有濃厚興趣，但是由於不景氣引發的經濟問題，連計畫還

沒擬定即已宣告不可行，失望之餘，對教育事業也冷淡了起來，連自己的小孩都沒錢上學，只能待在家裡幫忙務農。

對於市街計畫和林大老所面臨的狀況，敘述者有諸多評論式的描寫：「真是萬全之計，一人傳虛百人傳真。」(197)；「一為飽他的私腹而設計，一為他的名聲而設計的。」(199)；「C 大人為著 T 鄉而終夜不眠，一面林大老為著自己也終夜不休地計劃，然而 C 大人的計劃事事成功，大老的計劃卻是 C 大人的反比例。」(204)；「T 鄉本是大老的樂土，現在卻變成大老的怨府了。」(205) 敘述者在某種程度上，批評渴望一夕致富的群眾心理，同時對 C 大人和本頭的勾結，進行辛辣犀利的諷刺和批判。這樣的敘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在振興地方名義下進行的新興市鎮建設，只不過是當權者圖謀私利的虛晃招術，它帶給殖民地台灣人民的，卻是連基本生活都無法獲得保障的惡果。

無退路可走的林大老決定種植稻米，他披星戴月地辛勤工作，但在耕耘完畢準備插秧正需要灌溉用水的時候，水路巡視員卻以未繳納水路維持費為藉口，不讓他灌溉，這對他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很明顯地，水利公社將費用轉嫁到佃農身上，確實是導致農民沒落的原因之一⁸。不僅如此，日本人水路巡視員的傲慢也讓林大老憤慨不已：隨便責罵說「畜生」，露出對台灣農民鄙夷的態度，「橫直水是斷然不給你的，這條規矩是郡守大人定的，你若不服，可去郡役所理會就是。」(206) 受到如此屈辱的林大老，雖然悲憤交集但又無可奈何，只好決定改種甘蔗，但是隨後他又因「甘蔗區以外不准人插甘蔗」的規定，再次碰到「官廳不准插秧，會社不准插甘蔗」的尷尬窘境。遭到一連串打擊的林大老，終於悟出這一切都是騙局的道理，不過他只能如此歎息道：「第四工場建設……海口築港……自作農組合的好處……地價會高漲起來……一切的一切，唉，上當了，無一不是資本家的騙局……。」(206-207) 可見所謂新興現代都市的建設，只不過是由腐敗的日本官吏和本土資本家，以及拓植會社的聯手操

⁸ 以朝鮮為例，日本從 1920 年代開始推動產米增產計劃，雖然增產成果不甚理想，但卻照樣把米穀運到日本去，造成所謂饑餓出口現象。加上，在此過程中，地主的權利被強化，而佃農的利益相對弱化，水利公司又把費用轉嫁到佃農身上，而不是地主，如此因付不出各種稅金、公共費用和田租離開農村的沒落農民也開始增多。台灣的農村情況，基本上與此並沒兩樣。

作，所演出的一場鬧劇。林大老原本持有的新興希望，反成為新興悲哀的整個過程，就是殖民都市帶給台灣人民的結果。蔡秋桐透過這篇小說，控訴以開發與建設為目的而施行以製糖會社、拓植會社為主體的殖民政府台灣現代化政策，最後帶來的卻是犧牲農民等弱小階層的利益；相反的，權力階層與資本家卻能不斷地壓榨與剝削。這個真相，促使作者對台灣現代化提出質疑，也引發讀者起而重新思考現代性的真正本質。

三、新興都市與沒有明日的世界：《濁流》

《濁流》為韓國作家蔡萬植⁹（1902-1950）的長篇小說，1937年10月12日至1938年5月17日連載於《朝鮮日報》，共198回。主要內容以港口都市群山為背景，寫實地刻劃出殖民地時期朝鮮人的生活樣貌。《濁流》所描寫的1930年代群山，已被證實為符合實際群山的樣貌，大量出現的當地地名，以及交通設施、官公署、銀行、學校的位置，也吻合實際情況¹⁰。位於韓半島西南地區全羅北道海岸的群山，是一個在日據時期被日本特意興建的新興都市，也可說是象徵日本帝國主義下近代都市空間的典型例子。小說一開始就明白提示群山的地理及立地條件，並仔細描寫錦江流域的公州、扶餘、論山、江景等群山附近地區。在這一段敘述中，對於錦江流域的自然景觀，以及其他地區的景色，敘述者使用相當正面的語調口吻，但筆鋒一轉，錦江的支流從江景到群山，原本清澈的錦江河水開始變成混濁，而其岸邊形成的都市就是群山。如此被形容為「濁流」的都市群山，在發展的同時，卻奪走了錦江沿岸浦口傳統商圈江景的榮景，呈現出相對負面的描述。如果江景為民族資本的傳統商圈，那麼群山所代表的，就是依日本的殖民需要而急速建造的殖民都市。

⁹ 蔡萬植出生於韓國全羅北道，日據時期就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1924-1936年擔任《東亞日報》、《開闢》、《朝鮮日報》記者。1924年發表〈三條路〉，正式登上朝鮮文壇。代表作有〈Ready Made 人生〉（1934）、《太平天下》（1938）、《濁流》（1938）、《美麗的黎明》（1942）、《女人傳記》（1945）等。一般認為他擅長觀察社會，作品多具有諷刺文學的特徵，後收錄於《蔡萬植全集》（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9年）。

¹⁰ 邊華英，〈小說《濁流》所呈現群山的殖民地近代性〉，《地方史與地方文化》7卷1號（2004年），頁299-336。

群山發展為港口都市，主因是它具備了有利的條件：所在位置容易聚集忠清道和全羅道的穀倉地帶米穀，然後運送到日本大阪等地區¹¹，不僅如此，它是錦江沿岸的商品集散要衝地，也是作為實現日本主導資本主義的具體空間。從群山的地理和力學關係的敘述中，知道它的都市化目的及性格，在於殖民化和近代化兩種因素上面，因而與其他新興殖民都市一樣，其都市空間的結構也具有兩極化的雙重性。

群山在日本殖民期間，以作為北部港灣日本人的聚集地而發展起來，因此，北西部地區主要居住日本人，東南部地區則居住著朝鮮人。在此雙重性空間結構中，以警察署為中心形成的都心地區，周邊豎立著官公署、殖產銀行、商業銀行等主要機構。警察署建築在都心，目的非常明顯：為有效管理及支配殖民地。如此的空間結構，意味著都市的近代化與殖民化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市街又以警察署為基準分成東西兩大區域：西部地區有筆直寬闊的新作大馬路，以及井然有序的方形建築，外表看起來乾淨舒適；相對地，東部地區布滿迷宮般的狹小巷弄，以及通風不良髒亂無比的泥土屋，都市發展不調和情形，一目瞭然。從井然有序的西部和與它形成強烈對比的東部地區的描述中，不難推測出誰才是享有都市開發利益的主體。當然這都有其背景和原因：開港之後，進入群山的日本人，集結占據了上、下水道施設完備的好地段，而被他們擠到外廓地帶的朝鮮人，只得移往未開發的山腰地，過著貧窮的日子。日本人和朝鮮人居住地之間的環境和生活差異，在公共施設の配置上也可得到明顯印證。官公署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北西部地區；相反地，朝鮮人居住的東南部地區，除了幾間派出所，其他公家機構可是一間都沒有。這裡配蓋的派出所，明顯是為控制和管理朝鮮人而建。可以這麼說，這是為了有效統治殖民地而細緻規劃建構的監視體制的一環，也是日本以對立架構來對朝鮮人進行他者化的結果。

¹¹ 群山的地理位置，在集中湖南地區米穀後輸送到日本上面非常便利，是一個在殖民地型貿易藍圖下開發的典型都市。參考孫正穆，《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首爾：一志社，1982年），頁309。

這些雙重的都市空間配置，不僅見於群山這種新興都市，即連京城、開城等傳統都市，也一樣可以見到這種景象¹²。

其中，主要人物鄭主事一家所住的屯栗里和其住居環境，小說描述如下：

從這裡開始都是朝鮮人居住的地方。雖然把開福洞和九福洞合起來叫作山上町或開運町等新式名字，但是無論是以前或現在，村落的樣子一點也沒變，連一點「開運」的味道都感受不到。村落中間的路也沒鋪，路的左右有一些平地，但馬上進入視野的卻是山腰。……沿著山腰，急傾斜的坡地上，接連蓋著螃蟹殼般的草屋，也有些是老舊而且已經生鏽的鐵皮屋，連一點間隔都沒有，就像桶裡長出來的豆芽般，簡直密不通風。……開福洞、九福洞、屯栗里，以及離這裡稍遠的地方，在公車站後面的京浦里，這幾個地方加起來，七萬群山人口中有超過六萬的朝鮮人居住在此，以面積來算，群山府的幾十分之一也不到。¹³

原本的開福洞和九福洞，雖然改名為日本式的新地名山上町和開運町，但實際上卻是貧民階層密集居住的落後地帶。拿它與居留地中心發展的日本人居住地相比，屯栗里的環境就顯得非常惡劣，小說如此突顯兩者差異和截然不同的空間配置，是為訴說近代化的主體及受惠者只屬日本人，以確實反映出殖民地朝鮮的近代本質。

進入日據中期，群山已經成為湖南地區¹⁴的金融中心地，有朝鮮銀行、十八銀行的本町通，以及殖產銀行、商業銀行等銀行密集的十字路，是當地最為繁華的地帶。鄭主事的主要活動舞臺米豆場就位在這中心地帶，它可說是群山的心臟。鄭主事每天的生活，是從米穀取引所，也就是出入米豆場開始。所謂米豆與現在的股票類似，以三個月為單位預測米價之後再買賣米穀，屬於一種期貨買賣型態的交易。投機客必須先選定密集於米豆場周邊的仲買店作為代理

¹² 舉京城為例，以清溪川為分界，日本人主要居住在南邊，朝鮮人則居住北邊。不僅在居住地上有區別，商店街和娛樂設施的配置上，也具有雙重結構：朝鮮人繁華街為北邊的鐘路；日本人常去的則是南邊的本町（忠武路）、黃金町（乙支路）、明治町（明洞）等地方。

¹³ 《濁流》（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7年），頁20-21。

¹⁴ 「湖南」指的是包括光州廣域市在內，韓國西南地區的全羅南北道地方。

人，以取得自由出入米豆場的許可證。選擇仲買店必須繳納 50 元的保證金，米豆的買賣以一百石米為基本單位，交易完成之後，米豆公司會收 7 元的佣金。鄭主事買賣米豆已經上癮，但他卻經常輸錢，而且又要負責家中六個人的生計，日子過得非常清苦。賭博所引起的惹事生非、打架滋事乃家常便飯，每次他賠錢之後，都想以自殺了斷自己，但最後往往還是會自我安慰，勉強苟活下去。問題是，如此成為米豆奴隸，浪費金錢和生命的並不只有鄭主事一人，無論是青年、壯年，這一帶的朝鮮人幾乎個個都陷溺其中。

他們之中將全部財產蕩盡在米豆上面的人也為數不少，有些人還以土地擔保，從銀行貸出買賣米豆的本錢。但是預測米價並不容易，其中還藏有看不見的黑手在背後操作，因而賠上土地和金錢，一夕之間變成乞丐的人所在多有。但是殖民當局並未阻止這種類同賭博的投機行為，反而在背後暗中操縱，因為米豆的操作，容易讓他們搾取朝鮮人的財產和土地。朝鮮銀行、十八銀行、殖產銀行、商業銀行所密集的街頭越顯生氣，朝鮮人的土地和財產就越來越減少。自從金融中心米豆場成為群山的心臟之後，群山反而失去了活力，逐漸走向死亡邊緣。

整天沉溺於米豆，心存投機僥倖，忘記現實的朝鮮人，一旦出事，最後就會像鄭主事一樣，馬上放棄自己，心想「死掉算了」，而失去了自力更生的生存意志。這些沉湎於米豆場的朝鮮人，幾乎都是膽怯懦弱，卑微溫順的殖民地型人物。於此可以看出，近代都市群山的心臟米豆場，不僅是個讓朝鮮人淪為金錢奴隸的空間，同時也因此而造成朝鮮人過著沒有明日的的生活。

除了米豆場以外，近代都市群山還具備各種道路、鐵道、港灣、官公署、法院、銀行、醫院、藥局、學校等近代設施，而在這些地方工作的運轉手、機關士、法律家、銀行員、醫生、藥劑師、教師等新的職業群也跟著誕生，而且還成為近代都市的消費主體。當時在群山府的購物場所，除了日本人光顧的三中井百貨店以外，還有朝鮮人常去的開城商人根據地松坊等商店，形成頗具消費型態的都市面貌。朝鮮人商圈和居住地的接壤地，算是朝鮮人的消費地區，他們同時也在那裡接受新的文化和訊息。由於大部分的朝鮮人都付不起進戲院看電影的費用，因此大都只能跑去廉價酒店消費。而同樣的酒家也有內朝之分：

日本人去的是有藝妓陪侍的料亭；而朝鮮人當中較為有錢的人則去有妓生陪侍的飲食店，沒錢的庶民通常只能去小酒店尋找歡樂。朝鮮的享樂業情況也與台灣類似，隨著日本的進入而大大地發展起來，當中如賣春等色情行業，即是在殖民支配影響下被移植進來，再予以制度化的產物。

《濁流》係長篇小說，內容中出現相當多的人物和事件，其中，故事的中心人物為鄭主事的大女兒初鳳。整個故事圍繞著初鳳如何在此濁流般人生中載浮載沉的情節發展，小說背景以米豆場為舞臺，講述著住在新興都市群山的朝鮮人的故事，當中也呈現了當代人民的實際生活和他們的意識的轉變情形。

初鳳雖然是貧窮家庭出身，但她念過女學校，學過新學問，長相甜美，個性純真，結婚前對險惡的社會全無所知。初鳳原本心儀擔任醫生助手的南勝載，南勝載也對初鳳頗有好感，但畢業後不久，在父母的強求以及為家人的生計著想之下，被迫嫁給好色的騙子銀行員高泰守，從此走入她悲慘的人生歷程。婚後，才知道丈夫喜歡在外尋花問柳，絲毫不顧家庭；後來高泰守中了駝背張炯甫設下的圈套，不幸被打死後，她又遭到張炯甫的強暴；之後，初鳳淪為藥劑師朴濟浩的小妾，然後產下不知父親是誰的女兒；沒過多久，又遭到朴濟浩的背叛，只好與張炯甫一起生活；最後在無法忍受暴力的情況下，殺死張炯甫，而以悲劇收場。初鳳的悲劇性人生，不僅是一個女人的不幸而已，它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米豆為代表，在賭博和投機橫行的新興殖民都市中，過著沒有明日生活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形象。

初鳳的父親鄭主事染上米豆癮，整天無所事事地在米豆場周邊徘徊遊蕩。他原本是個擁有土地的自耕農，也念過新舊學問。他之所以如此沒落，小說雖未明確交代，但以敘述筆調來看，顯然是因日本在朝鮮農村以維持半封建地主制的手段推動產米增產計劃，結果導致許多農民破產時，被迫遷移到都市邊緣求生存的犧牲者之一。另外，初鳳的先生高泰守，用欺騙的方式娶了初鳳，害她掉進不幸的深淵。他婚後也跟房東太太金氏通情，又跟妓生杏花來往。除了追求酒色以外，他似乎沒有別的人生目標，度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他還為了支付享樂費用，利用銀行員的職權，挪用巨額公款，又靠朋友張炯甫的牽線，投入米豆賭博，試圖翻本來規避破產危機，結果反而一再賠錢，事態變得更加

嚴重。但他沒有任何打算，漠然地想著如果掏空公款的事被揭露，倒不如死掉了，也因此對他來講，剩下的人生只要追求快樂就可以。高泰守的朋友張炯甫，算是最為陰險的人物，為了不甚嚴重的小事情，對泰守心懷仇恨，加上對初鳳存有非分之想，因而設下陷阱想要除去泰守。不知情的泰守勾引了金氏，炯甫卻偷偷密告金氏的先生韓參奉，結果在姦情現場，泰守和金氏被韓參奉活活打死。他為了金錢跟銀行員高泰守結下朋友之情，然後讓他陷入死亡陷阱，又強暴了初鳳。可見張炯甫和高泰守，都是物質和金錢至上價值觀已經內化，屬於在米豆賭博和投機蔓延的新興都市中生活的代表性人物。如此，《濁流》以港口都市群山為背景，刻劃出在此新興殖民都市中，為生存掙扎的下層民眾群像，相當寫實地反映了當代的現實。小說中雖然也有出現如南勝載和初鳳妹妹繼鳳等力求上進的正面人物，但是整體來看，《濁流》人物的生活樣態和精神意識，主要還是在反映急速成長的殖民都市群山的否定面形象。

此外，進一步考察群山人的日常生活，當可發現暴力的普遍化現象：在米豆場每天上演投機客之間的打架；為了促成婚事，鄭主事夫婦對女兒初鳳威逼恫嚇，行使間接性暴力；泰守和金氏的性倒錯症暴力場面；南勝載知道高泰守要娶初鳳之後感到非常憤怒，腦海中想像著對他行使暴力；韓參奉在姦情現場殺死金氏和泰守；炯甫對初鳳的性暴力，等等。這些充滿暴力的恐怖事件，就如都市的速度感一樣，進行得非常急切。如果仔細觀察這些暴力的發生情景，就可發現無論施暴者是誰，幾乎都因人物有無力之感所導致。染上米豆癮的鄭主事，每天在外面跟其他投機客打架，理由來自沒有明天的絕望感或者對自己的無力感；金氏對初鳳的憎恨，也是來自自己比不過初鳳美貌和年輕，而感到沒有信心的無力感；南勝載對高泰守的施暴想像，也因自己沒有能力抓住所喜歡的初鳳，而產生的深沈無力感；初鳳和炯甫之間，充滿暴力的性關係，也是炯甫因為自己身體殘缺的一種補償心理，想要挽回信心和解除無力感，而以暴力對待初鳳的緣故。因此，《濁流》中充滿的暴力遍在化現象，其深層的意義在於殖民都市中生活的人們感到的無力感。可見，近代都市的發展並沒有帶給朝鮮人幸福，反而是在貧窮和物質慾望交加的環境下蔓延的暴力關係中，逐漸沉淪下去，展現出作者對殖民新興都市的強烈負面認知。

四、結語

本文以日據時期台灣小說蔡秋桐〈新興的悲哀〉和韓國蔡萬植《濁流》為對象，探討了新興殖民都市的建設過程、都市空間的結構性特色，以及其中的殖民地人民生活樣態和精神意識。台韓兩國同樣都受到日本的殖民支配，並在日本所主導的計畫下推動殖民都市建設，因此，選出兩篇同是探討由日本主導興建的殖民都市的小說，據以比較考察殖民都市和人民生活的關係，有其必要性和深遠的意義。由於作品篇幅長短不同，兩篇小說所探討的都市規模和性格自然不盡然相同，而且都市開發和市街形成的時期也有些差距¹⁵，不過，無論在都市空間的結構上，或者就生活在其中的殖民地人民的處境上，都呈現了相當類似的樣貌，本文以「悲哀」和「沒有明日」，來概括「新興的悲哀」和《濁流》中台灣人和朝鮮人的處境。

〈新興的悲哀〉中的新興市鎮，其地理位置雖不甚明確，但從內容中提到虎尾溪和海口，大略可以推測，應該是現在的雲林縣境內北港附近。都市的規模應屬小鎮，從描述工廠建設地和港口附近的場景來看，日本應該是以小規模的地方產業都市來進行規劃。與此相比，《濁流》中的群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近代都市：開港以前人口只有五、六百人的小漁村，在日本進入之後，經過有計畫性的開發，而發展成韓半島西海岸的主要港口都市¹⁶。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試圖把朝鮮打造為糧食供給基地，群山即因其運送米穀到日本的有利位置而受到注目，因此以日本人居留地中心急速地成長起來¹⁷。就像小說所刻劃以米穀取引所（米豆場）為中心，盛行賭博投機性米豆的群山，即是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韓國西南地方金融和消費的中心都市。雖有這些許規模上的差異，但兩個都市的形成過程仍然有其共同點，亦即都是為了宗主國日本的利益而在有目的性的計畫下建立的都市。因而在都市空間的改造或興建上，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機能是完全不被考慮在內，空間的配置和結構，也出現

¹⁵ 以內容來判斷，〈新興的悲哀〉中的新興市鎮的落成，大約在 30 年代初期；而《濁流》中刻畫的群山，在 20 年代即已完備了近代都市的規模。

¹⁶ 同前註 10，頁 299-310。

¹⁷ 金昌植，〈日帝下韓國都市小說研究〉（釜山：韓國釜山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4 年），頁 48。

有差別性的兩極化現象。並且興建的速度和過程，急速又不合理，暴露出殖民統治下政策不健全的問題。

在兩篇小說中，生活在新興都市的人物，沒有一個例外的，都走上了沒落之途：林大老不僅失去了對新生活的期待，還受到官廳和拓植會社的限制，連轉務農事也不如意；而鄭初鳳更是悽慘，被不幸命運擺佈的她，最後還以殺人收場。他們的沒落過程和原因，與急速膨脹的新興都市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新興都市的建設，又與日本的殖民利益和統治階層的利益相符合，因此人物不幸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殖民政策和統治正當性的問題上面。在〈新興的悲哀〉中，圍繞著新興市鎮的建設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簡直就是殖民當局不當統治台灣的寫照。官憲利用職權任意適用法律、為了個人利益動員警察組織和近代媒體；水利建設和米糖問題上，當局的無標準和無政策性等，都是造成人物走向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對此，作者蔡秋桐都一一揭露開來，並給予辛辣的諷刺和銳利的批判。

觀察〈新興的悲哀〉中的市鎮建設問題，可以發現與橋谷弘所提出日本在台北實施的市區改正計畫狀況相吻合的地方。在滿洲或台灣，後藤新平和佐野利器等都市計畫家，在幾乎空白狀態下，實施了所謂「縱橫無盡」的都市計畫：在滿洲，區別於既有中國都市，另形成滿鐵附屬地，或隨著產業開發，建設新的都市；而在台灣的台北，在佔領之後因颱風被破壞的傳統市街上面，建設新的都市。因此，在這些都市的興建上，不會發生住民的移住引起的抵抗，或對既有設施的顧慮。如此，在台灣或滿洲的都市計畫，具備了人才、財源、土地三要素，加上無需要考慮官廳之間的調整、議會對策、住民問題的殖民地，使得可行。佔領台灣後不久就著手整備下水道；自 1899 年開始實施市區改正計畫。到了 1938 年，把台北近郊的松山莊收編進來，形成了所謂「大台北」地區，都市計畫就是為了因應如此市街和人口的膨脹。但是，考察台灣都市計畫的財源問題，就知道問題不少。從 1920 年開始實施市政，因此市區改正事業費，有國費移轉到市費，但是移管之後，受到財政問題的莫大影響，無法因應市街膨

脹問題，進入幾乎停擺的休止期狀態¹⁸。兩者的情況雖然不盡然相同，但在開始時積極推動、經費出資和資金不足問題、撤守放棄等方面，從某種層面上來看，說它是日本在台灣興建殖民都市的縮小版也不為過。而《濁流》中的群山，被刻劃得更加不堪，以米豆為代表的投機和賭博業橫行於整個都市，失去了勞動意志的懦弱人們，被金錢至上價值觀所支配。整個故事從打架開始到殺人結束，反映出近代都市中沒有明日的殖民地朝鮮人的處境。如此以描寫新興都市為主要題材的兩篇小說，呈現的是台韓兩國共有的殖民地近代真相：新興殖民都市建設的急躁和任意性；以賭博、投機、享樂產業作為麻醉殖民地人民的手段，進而從中圖謀殖民支配階層的利益。從兩國作家都對此共同進行諷刺和批判的情形來看，在日本主導下的都市化和近代化進展，並未能解決殖民地人民的貧窮問題，反而更加深化階層分化和民族差別，甚至誤導他們在近代都市帶來的「新興」夢幻當中，無限陷入「沒有明日的悲哀」。

¹⁸ 同註 1，頁 162-169。

參考資料

一、史料

《台灣新民報》387-389 號（1931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7 日）。

二、專書

文學與思想研究會編，《蔡萬植文學的再認識》（首爾：昭明出版，1999 年）。

芳民浩（音譯），《蔡萬植與朝鮮近代文學的構想》（首爾：昭明出版，2001 年）。

金宏基（音譯），《蔡萬植研究》（首爾：國學資料院，2006 年）。

金允植編，《作家論叢書（12）——蔡萬植》（首爾：文學與知性社，1984 年）。

孫正穆，《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首爾：一志社，1982 年）。

張恆豪主編，《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年）。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2005 年）。

蔡萬植，《蔡萬植全集 10 冊》（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9 年）。

蔡萬植，《濁流》（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7 年）。

橋谷弘，《帝國日本と植民地都市》（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

橋谷弘著，金濟正譯，《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殖民地都市》（首爾：母題書出版社，2005 年）。

三、期刊論文

金昌植，〈日帝下韓國都市小說研究〉（釜山：韓國釜山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4 年）。

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 年）。

邊華英，〈小說《濁流》所呈現群山的殖民地近代性〉，《地方史與地方文化》7 卷 1 號（2004 年）。